

# 我们都是“小读书人”

□林颐



《歧路彷徨》  
张艺曦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25年4月

说起历史上的“读书人”，我们谈论的多是圣哲、大儒或至少有点名气的士人，然而，构成这个群体的，其实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就被边缘化的普通书生。

《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作者张艺曦为“小读书人”下定义：指那些中低级功名的士人，甚至没有功名的布衣处士，以及在地、没有跨地域影响力的读书人。他们寒窗苦读，四处求学，寄宿在学院，聆听大儒的教导。张艺曦形容他们就像被大人物带在身边的小读书人，或者更形象的，就像今日许许多多的博士生、博士后，蹉跎在书本与现实之间，在歧路和困境中茫然失措。

作者深入挖掘地方文人的文集、笔记、族谱等大量一手资料，从中勾勒出小读书人的群像。他们自幼接受蒙学教育，刻苦攻读儒家经典。然而，科举充满了艰辛与不确定性。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屡试不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不仅要面对繁重的课业负担，还要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他们在追求知识与应付科举之间艰难平衡，内心充满了彷徨与挣扎。比如，涂伯昌与妻在山中孤苦度日，寒冬时没有保暖的衣物，连三餐温饱都成问题，只能共饮一杯水。后来，涂伯昌以《一杯水》命名自己的文集。如今读来，这何尝不是今天的寒门学子的写照？在生

计与功名之间的挣扎与取舍。

张艺曦的研究领域是明清思想史、地方史与家族史，出版有《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等作品。《歧路彷徨》也延续了阳明学的研究路径。

该书聚焦于明中晚期，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阳明心学犹如一阵新风，吹散了传统理学的沉闷；文学复古运动也在文坛掀起波澜；三教合一的思潮更是在民间悄然蔓延。小读书人在不同的学术学问之间徘徊，犹如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小船，左右摇摆，试图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有些人深受阳明心学的启发，追求内心的良知与自由，然而，这种思想追求与现实的科举考试和生计需求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在这多元的思想浪潮中，在这些宏大的学术与文化潮流背后，穿梭着无数小读书人的身影。他们虽没有足以改变时代走向的影响力，却构成了当时读书人群体的主体，真切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文化生活。

小读书人从各地前来学院听讲，在回归乡里之后，往往会对大儒的学说做二次的传讲，阳明学正是依靠这样的方式在乡野间里及基层民众之间产生广而深的影响力。如作者所说，正是大儒在学说上的创获，加上小读书人的推广，两者

相互交融，才有明中晚期阳明心学运动的风潮。可是，当阳明学衰落之后，很多情况也相继发生了变化。大儒可以继续讲学，坚守学术主张不变，但小读书人却必须考虑现实的处境，考虑家庭的生计需求，作为升斗小民，生活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家庭与求学，谋生与制艺，孰重孰轻？他们尽力去平衡二者。

很少有作品的序和导言，像《歧路彷徨》那样剖心沥血、诚挚感人，在他书写明代小读书人的困境时，他总是不由自主想到今日小读书人的境遇。而我读着他的肺腑之言，也不由得深感悲伤。读书到底有何用呢？我们可以讲出很多大道理，但我们无法一概而论，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状况、性格特征都是不一样的，而《歧路彷徨》让我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在尽力发挥的主观能动性，这些无足轻重的人们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希望。

书中末章讲述明代读书人的记忆法，这些五花八门的记忆法凸显了中国近世士人的记忆力焦虑，同时也显示了人文学科的无用之用，即便是强调以记诵为功，而有见识的学人都清楚，记诵是为了理解义理，穷尽万事万物之理，然后提挈良知。阅读《歧路彷徨》，书中的诸多描述，仿佛映照今日学子汲汲孜孜的身影。

## 蝴蝶创造的人间诗境

□天凌



《寻蝶笔记》  
魏兰君 廖怀建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1月

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孩子，多数都有过看蝴蝶展的经历，当数百上千种的蝴蝶聚集在一起，翅翼散发宝石与丝绸般的精妙光彩时，我们很难想象它们都是从丑陋毛毛虫变化而来。我们只模糊地知道蝴蝶是害虫，那为何有些蝴蝶还是国家保护动物呢？某些蝴蝶为何不喜欢访花，难道它们真是吃露水和月光长大的吗？这些疑问可能在一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小孩心中埋藏了几十年，只有当他们看到了《寻蝶笔记》这样的科普图书，少年时代埋藏在心中的众多疑问，才会有一个解答的机会。

这本书，是魏兰君与廖怀建两位生态爱好者在长三角地区找寻不同的蝴蝶所得。两位作家从蝴蝶的寄主入手，透过对纷繁多彩的植物的花、果、叶、种荚的认识，将寄宿其上的蝴蝶描绘下来。没错，这本书的灵魂，就是博物学传统记录方式——水彩手绘。这种形式能够更加细腻地捕捉到那些不易被发现的细节与拟态，让我们更深入地领略蝴蝶这种自然生灵的风采。作家借助优美的文笔与柔和的水彩写生，为读者带来了一段难忘的蝴蝶邂逅之旅。

以南方城市中常见的行道树香樟为例，它吸引的是青凤蝶的幼虫，这种蝴蝶翅面有着青绿色透明斑块，在飞行时宛若一片飘落的玻璃糖纸，十分醒目。除了青凤蝶，白带螯蛱蝶也常以樟树

为家，后者是一种大型蛱蝶，颜色尤如一片正在变红的秋叶胸针。白带螯蛱蝶对花朵不感兴趣，却喜欢吸食腐烂的水果，因此，你常可看到那些被鸟类啄破的水果上，停留着它们的身影。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担心，蝴蝶会对植物造成危害。其实，答案通常是否定的。首先，蝴蝶的寄主植物种类比较单一，其生存和繁衍能力并不算强，此外，在大自然中，蝴蝶还有众多的天敌，如鸟类、蜘蛛和其他捕食性昆虫，它们共同维持着蝴蝶种群的平衡。因此，我们很少见到蝴蝶对绿化植物造成严重破坏。而且，城市化的进程、农药的使用以及气候剧烈变化等因素都对蝴蝶的生存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也是越来越多的蝴蝶种类，被国家列为濒危物种的原因之一。

其实，蝴蝶的成虫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作为传粉昆虫，有助于植物的繁衍和基因交流。举个例子，很多拥有小花园的城市居民喜欢在家中种植芸香科柑橘属的果树，这些果树的果实和叶片通常都密布着散发浓郁芳香的油点，或许是这种芳香气味过于诱人，也引来了众多凤蝶的青睐，包括柑橘凤蝶、玉带凤蝶、美凤蝶、蓝凤蝶、玉斑凤蝶和达摩凤蝶等。其中，美凤蝶是一种典型的雌性多形蝴蝶。雌蝶的外形变化多端，有尾凸、白斑、红斑等识别特征，呈现出繁多的排列组合，甚至会出现雌雄同体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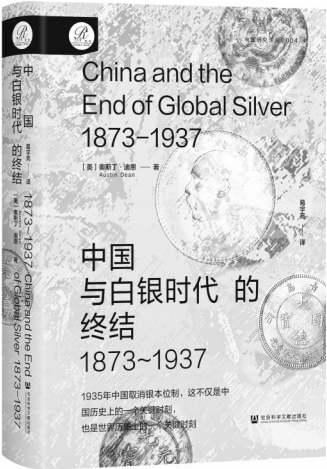
——一只蝴蝶左右翅翼分别属于不同的性别，这种变异常常令人赞叹不已。出人意料的是，同样属于芸香科的花椒，也是凤蝶们的重要“口粮仓库”。因为在北方，柑橘无法适应寒冷的天气，耐寒耐干旱的花椒就成为凤蝶们最重要的寄主了，花椒的叶片上散布着富含香气的油点，一串串鲜红的花椒果实的种皮上也分布着凸起的油点，它们能为蝴蝶带来香麻的口感。没想到吧，有些蝴蝶的口味也类似于四川人。

我国是蝴蝶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记录在案的蝴蝶种类超过2000种。其中不乏仅在我国分布的珍稀特有品种。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中，汽车尾气、城市噪声、光污染以及化学农药等因素都使蝴蝶的栖息环境变恶劣，但令人欣慰的是，仍然有一部分蝴蝶适者生存，顽强地适应了当下环境，它们在城市的角落、公园绿地或者街头巷尾出没，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大自然的清新与活力。

读了这本书，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参加保护蝴蝶的公益活动，在自家庭院创造一个“蝴蝶友好花园”，观察记录各种翩跹而至的美妙蝴蝶，“只观察，不打扰；只记录，不捕获”，让这些美丽的精灵拥有更美好的生存环境。如此，大自然中才会遍布诗境，随时闪烁物华，而后者，才是人类体会生命多样性的绝妙路径吧。

## 白银时代的终结

□禾刀



《中国与白银时代的终结，1873-1937》  
[美] 奥斯丁·迪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年1月

本书作者奥斯丁·迪恩长年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本书中，他以时间为线索，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视角，还原了中外官员、银行家、商人、学者和记者为推进中国货币改革的建言与积极奔走。在奥斯丁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不仅唤醒了中国人勇敢地反抗列强的侵略，同时也激发国人在币制改革方面的觉醒，并努力通过建立统一的货币标准，从而实现货币主权。然而，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场上，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以一己之私，企图主导中国货币改革方向，从而也为白银走向终结敲响了丧钟。

19世纪的中国，白银作为中国的货币时，主要以重量作为价值单位，但计量标准五花八门：“中国各地有众多的‘两’作为记账单位，每个单位的精度与重量都不同”，据历史学家戴建兵估计，在晚清，全国至少有170种不同的常用银两标准。因为缺乏统一的交易标准，所以如何交易结算往往颇费周折，奥斯丁戏称为每一次交易都是“智慧的较量”。

除了度量不同带来的麻烦外，清朝货币体系还有另一重复杂性。有清一代，1两白银可兑换1000枚铜钱。但由于两种金属市场价格的不稳定性，导致经常会出现“银贵钱贱”或“银贱钱贵”的错配现象。另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是，白银价

值并不稳定。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要求，“按海关银对各国金本位制货币的比率计算，以黄金计价的债务”。虽然条约注明的是海关银，但又以黄金价结算，这意味清政府要承担汇率风险，除非白银价值上升。

白银退出中国货币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至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了白银货币，选择了金本位制。黄金的高度稀缺，加之国内政局的四分五裂，使得中国无法紧步金本位制的全球潮流。“1914年，国会在解散之前通过了新的《国币条例》。该条例选用了银本位制，但表示中国应向金本位制努力”。按照《国币条例》，俗称“袁大头”的银币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铸币厂铸造。“袁大头”对成色和铸造工艺从法律上进行了明确要求，较好地保证了货币成色与质量，这也是民国币制改革中少有的亮点。

奥斯丁认为，无论晚清还是民国，其货币改革阻力从来不只是国内，更有国际势力。“20世纪初，随着不同国家试图将中国货币与本国货币单位挂钩，中国很快就成为‘各种金汇兑本位制计划竞争的战场’”。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借贷款施压，日本的野心更是昭然若揭，“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宣布日本在东亚负有特殊责任，并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提供任何‘其所不乐见的援助’”。

1932年初，在日本进攻上海之时，南京国民政府取消了不同银两记账单位，确定了银本位制，迈出了统一白银货币标准的重要一步。然而，随着1933年美国《托马斯修正案》的出台，国际银价一路上涨，直接刺激国内白银迅速外流。据研究，年流出白银量高达1.8亿两。几乎与此同时，已经侵战东三省的日本，大肆收购走私白银，破坏白银货币的稳定。

在全球白银产量高企，全球只剩中国还在使用白银货币之时，理论上白银供应充足，事实上却是国内市场上居然出现罕见“钱荒”。“钱荒”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推高了币值，也严重打压了出口贸易。在多国的围猎下，“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脱离银本位制，改用由政府控制的货币——法币”。众所周知的是，法币并未能成为民国政府的金融“稻草”。

无独有偶，白银货币谢幕之时，正是“罗斯福新政”的高光时刻。在结语中，奥斯丁称，“20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希望将中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是为了鼓励美国向中国出口”。而在21世纪，“美元与中国货币之间有了直接联系，然而，在美国并没有多少人称赞这一进展”。奥斯丁以讽刺的口吻写道，今天，“美国继续试图影响中国的货币，但鉴于长期以来的历史，很可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